

戊戌思潮论稿

张锡勤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直報



戊戌思潮论稿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哈尔滨

引 言



今年是戊戌维新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这场变法维新运动所以值得我们纪念，并对它作更进一步地深入反思、研究，是因为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艰难曲折的近代化历程虽然不是起步于戊戌维新，但是，中国的社会变革和近代化的全面启动则始于戊戌维新。从此中国方才更明确地向民主化、工业化的方向、目标全面前进。

1922年，梁启超曾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进行变革的历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因而首先从器物的层面学习西方，以图自强。“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于是进一步要求从政治、经济制度上学习西方，进行全面的变革。“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要求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观念意识进行深入的改造（《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九）。70多年前梁氏的这一看法，今天已为多数学者所赞同。按照梁氏的三阶段说，戊戌维新不仅对第一期作了总结清算，开始了第二期的进程，而且又提出了第三期的任务。显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戊戌维新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正是它扬弃了洋务派的纲领，直接间接地影响了辛亥革命，并成为“五四”的前驱、先导。

作为戊戌维新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曾多次谈到戊戌维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1901年，他在给康有为作传时即曾说：“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此事理之所必至也。”（《南海康先生传》第四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927年，在公祭康有为时他再次说，戊戌维新“虽骤起而卒蹶，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公祭康南海先生文》，《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四上）。与维新派交往颇密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国后所作的回忆录中也曾说：“维新的运动像是一条溶化了的大冰河，或者是开了冻的黑龙江，把巨大障碍的冰块冲到海洋。”（《留华四十五年记》第十二章《中国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60页）这些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的。这里，梁启超两次说到的“新中国”，显然是指开始向近代化迈进的中国。他把戊戌维新列为中国近代化史的第一章，是很有见地的。

戊戌维新既是一场呼吁救亡图存，要求变法维新，实现制度变革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实现观念变革的思想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虽然被中途扼杀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它初步实现了观念变革，造成了国人的思想解放，取得多方面的成效，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1901年，《清议报》的一篇文章曾对戊戌维新的成败作了这么一段分析、估计：“中国维新之机，西太后挫之于北京，张之洞戕之于汉口，……而维新之火焰不少减，反有挟浪乘风披靡中原之势。是非所谓外形败而实胜耶？”（赵振：《说败》，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17页）这一认识是很富有辩证色彩的。

在整个变法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又极

重视理论准备和思想发动。为了给变法维新制造舆论，他们大力宣传新思想，输入新学说，传播新观念。随着维新运动逐步深入，他们又自觉认识到，社会变革乃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势必应该包括文化思想领域的革新。于是，文化思想革新更受他们重视。维新派的领袖与骨干，既是政治家又是启蒙思想家。经过他们的一番理论建设，特别是他们的宣传鼓动、呼吁呐喊，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了一股生气勃勃、锐不可当的崭新社会思潮，这便是戊戌思潮。

戊戌思潮的兴起，始于民族危机的刺激。但基于对历史潮流和客观形势的正确认识，作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维新派思想家们比较正确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并指出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他们坚定地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谋求振兴，就必须学习西方，进行资本主义的变革，而欲实现变革，必先进行思想启蒙。救亡、变革、启蒙是戊戌思潮的主题。这三大主题充分显示了戊戌思潮的进步性，决定了它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的光辉地位。

维新派所倡导的变革，旨在谋求中国的振兴，使落后的中国赶上先进的西方，亦即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对于中国的近代化，维新派思想家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划。他们在向往、追求民主化、工业化的同时，又对历史主体人的近代化给予了高度关注。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戊戌思潮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批判性。为了宣判旧的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必须让位给新的；为了论证新的取代旧的的合理性、必然性，维新派思想家将自古以来视为天经地义、神圣永恒的天命、祖制、经训，以及君权、父权、夫权……，统统推上了理性的审判台，让它们接受理性的无情审判。恩格斯在评价近代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时曾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

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批判时代，维新派思想家们所作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和他们的西方先辈们一样，他们当时也的确具有这样的气概、魄力和勇气。而且，由于他们的倡导，社会批判意识由此在中国生根，影响了几代中国先进分子。

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诞生了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戊戌思潮是19世纪末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新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而在它兴起之后，又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变革、近代化的进程起了不容忽视的促进、推动作用。按照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意愿要求，维新派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作了全面的清理，第一次作了全面的再认识、再评价，对于其中阻碍中国近代化的糟粕作了有力的触动和清除。在与旧文化的交锋中，他们所倡导的新文化取得了可喜的初步胜利。对于西方的近代文化，他们作了更广泛的介绍、输入，从而给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输入了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活力。通过思想启蒙，在戊戌时期初步实现了观念变革，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次的思想解放，在中国逐步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格局。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和近代化的进程。

1895年的“公车上书”是变法维新运动兴起的标志。这场变法维新到1898年的“百日维新”期间达到高潮。所以，这场变法维新运动通常称之为戊戌变法、戊戌维新。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通称“戊戌政变”），刚刚付诸实施的变法维新惨遭扼杀。但是，作为一股正在蓬勃兴起、反映时代需要的社会思潮，戊戌思潮并未因政变的发生而断流、而消失，在此之后它仍然在继续发展，并进一步深化。

就戊戌思潮而言,1898年9月21日以后的四五年,是它发展史上更为重要的阶段。变法维新仅百余日即遭扼杀,这一严峻的事实迫使维新派以至一切忧国之士,势必要对救亡、变革的方略、途径作更深入地思考。东渡日本后,梁启超等人借助日文书籍,对西方近代的思想学说较前有了更多的了解。梁曾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而且,由于身居异国,有了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思想言论上较前更加自由,更少顾忌。因为现实的制度变革已被迫中断,这也迫使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理论思考和启蒙宣传。因此,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等人提供了较前更多的理论成果,思想进一步成熟、深化。这时,他们对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作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思考。他们所发动的文化批判与重建工作这时也全面展开。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影响较之政变前的《时务报》更大。《新民丛报》出刊后,“国人竞喜读之,朝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受其影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后来,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承认,他们在青年时代曾受到《新民丛报》特别是梁启超文字的积极影响。

大致说来,从1895年的“公车上书”起,戊戌思潮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思潮,处于领风骚的地位。但到1903年,它的主潮地位为革命思潮所取代。

早在“公车上书”前,孙中山即已成立兴中会,并开展革命活动,但势力与影响尚不大。“百日维新”被扼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沙俄强占东三省拒不撤兵……,这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变都在步步激发革命风潮的勃兴。到1903

年，形势有明显变化。在这年年初（旧历元旦），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有人公开发表排满革命演说。不久，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成立“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接着，邹容、章太炎发表《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造成巨大震动。由此而引发的《苏报》案使革命情绪进一步高涨。在戊戌政变后，维新派的队伍便逐渐发生分化。一些人抛弃改良、投身革命，而梁启超则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摇摆。面对1903年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梁启超结束了思想上的摇摆，公开反对革命。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以及游历北美后所产生的民族自卑感，1903年秋梁从北美返回日本后思想大变。他公开发表了“告别共和”和“梦俄罗斯”的宣言，明确倾向开明专制。这时，梁启超等人关于中国如何实现近代化，如何进行社会变革的基本主张已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失去其先进性。于是，越来越多的先进中国人告别改良，投向革命。从此，革命思潮取代维新思潮成为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本书所论述的范围，大致以1895——1903年为界。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爱国主义与忧患意识	1
一、祖国在危急中	2
二、“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	7
三、救亡与振兴“惟有自强”	12
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合群保种”	16
五、对帝国主义的模糊认识和矛盾态度	23
第二章 论“法必变”与“变法当知本原”	29
一、“四千年未有之变局”	30
二、“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34
三、“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	40
四、“变法当知本原”	47
五、“变法之本原”是什么？	52
第三章 论“兴民权”	57
一、只有“兴民权”才能救中国	59
二、民权观	63
三、平等观	68
四、自由观	73
五、政变前的宪政思想	79

六、政变后的宪政思想	88
七、论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个人解放 与民族解放	93
第四章 论“三强”、“开民智”、“新民”	100
一、速成与渐进	101
二、“三强”为本说	104
三、“权生于智”说	111
四、“开民智”与“开绅智”、“开官智”	114
五、从《中国积弱溯源论》到《新民说》	120
六、对“奴隶性”的清算	125
七、对“新民”的具体规划	129
八、“三强”、“新民”诸说的理论贡献和失误	134
九、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康梁的分歧	138
第五章 文化批判与重构之一：对孔子和儒学的利用 和改造	141
一、康有为关于“孔教复原”的主张	143
二、宋恕关于“排洛闽之伪教以复洙泗之真教” 的主张	153
三、谭嗣同关于孔教改革的主张	158
四、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公开批评	163
五、严复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批评态度	167
第六章 文化批判与重构之二：“文化革命”帷幕的拉开 ..	172
一、文化重构的必要与方针	173
二、“道德革命”（上）：对旧道德的批判	180
三、“道德革命”（下）：对新道德的提倡	186
四、“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提倡白话文 和推广“官话”	196
五、“史界革命”	205

六、哲学变革·····	210
七、戊戌“文化革命”的积极影响与不足·····	215
第七章 文化批判与重构之三：关于建立宗教的主张·····	218
一、对宗教的关注·····	219
二、出于非宗教动因的宗教热情，拟建新宗教 的特点·····	226
三、康有为建立孔教的主张·····	229
四、谭嗣同以佛为主融合儒佛的主张·····	234
五、梁启超否定孔教为宗教和对佛教的高度赞扬·····	237
第八章 经济近代化的种种设想·····	242
一、告别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呼吁·····	244
二、建设近代交通与近代农业·····	250
三、提倡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254
四、论“尚奢”与开源·····	257
五、论“商战”·····	264
第九章 为寻求救亡和变革的动力而呼唤“心力”·····	270
一、论“唯心派造人物”，提倡自强其心·····	271
二、对佛学与心学的极度推崇·····	275
三、论自心造世界·····	277
四、“心力”种种·····	281
五、对“心力”的种种期望·····	286
第十章 又一种忧患，大同思想·····	291
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	292
二、现阶段纲领与未来蓝图·····	297
三、救世主义与人道主义·····	300
四、大同社会的性质·····	303
五、大同思想的积极影响及其空想性·····	308
结语：戊戌思潮的积极影响与不足·····	311

第 一 章

爱国主义与忧患意识

虽然，早在明清之际，少数知识精英即已发出走出中世纪的微弱呼声，但是，中国蹒跚地走向近代化道路是在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后。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从一开始便是救亡图存、抗拒殖民地化的过程。在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与民族振兴的任务始终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在其开始阶段，它与民族危机是同步深化的。空前严重并日益深化的民族危机乃是戊戌维新思潮的催化剂。正是由于中法战争失败、边疆普遍危机，引发了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正是由于甲午战争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引发了1895年春的“公车上书”，使维新运动开始走向高涨；正是由于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导致了维新运动全面高涨，出现了“百日维新”。正如梁启超所说：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

始也。（《戊戌政变记》第一篇第一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正是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一批志士仁人走上了变法维新的道路，而救亡图存、洗雪国耻则成为那时人人关注的课题。面对这无比庄严神圣的课题，谈变成为时尚，连守旧派一时也不敢公开反对变法。变法维新运动所以在短期内造成巨大声势，与那时的客观环境是分不开的。

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时代精神的主题，它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题。戊戌维新运动首先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因此，戊戌思潮首先具有鲜明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同时，经过戊戌维新，爱国主义也由古代的形态发展为近代的形态。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那种使命感、责任感也因时代的变化而蕴涵了新的内容。经过维新派的弘扬，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更加浓烈、深刻、持久了。

一、祖国在危急中

戊戌思潮首先是通过敲起“祖国在危急中”的警钟使国人惊醒的。维新派正是从救亡图存来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与紧迫。他们首先举起的是爱国、救亡的旗帜。戊戌思潮自始至终带有浓郁的、斩不断的忧患意识。

19世纪70—9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客观形势是西方列强更加加紧了对亚洲、对中国的侵略。对于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局势和西方列强的图谋，维新派思想家作了比较准确的分析和揭露。在1888至1898年的十年间，每到危急关头，他们都及时向国人敲起警钟。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便对中国所处的被包围的形势作了这样的描绘：

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上清帝第一书》）

总之，由于“外夷交迫”，当时“国势危蹙，在危急存亡之间”（同上），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康有为又特别提醒清廷注意日本的动向：“日本虽小，然其君臣自改纪后，日夜谋我，内治兵饷，外购铁舰，大小已三十艘，将翦朝鲜而窥我边。”（同上）事实正如康有为所料，仅六年之后，日本便发动了侵朝、侵华战争，造成了比康的预想更为严重的后果。

对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维新派认为这乃是“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其影响和危害超过此前诸条约。其一，此前的割地尚只是“边徼”，“今则割及内地，渐剪腹心。”（同上）其二，《马关条约》中关于允许日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等规定，则将中国“利权”、“制造之权”“一网而俱尽”，“直合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而亡之。”（谭嗣同：“思纬壹壹台短书·报贝元徵》）其三，更重要、更直接的是，由于原本小国的日本在华获得如此巨利，必将大大刺激、鼓舞西方列强的侵华野心。“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将问新疆，德、奥、意、日^①、葡、荷皆狡焉思启”，“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瓜分之祸将在目前。

康有为关于西方列强必然“速以日本为师”，“接踵而来”的

^① “日”指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的异译、旧译。

估计是准确的。相隔仅两年多,1897年11月,德国便强占胶州湾,一个月后俄国又强占旅大。以此为开端,列强迅速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对当时的形势,康有为作了这样的描绘:“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如蚁慕膻,闻风并至”,“诸国咸来,并思一膻。”(《上清帝第五书》)

对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史以及当时的世界局势,维新派思想家是有比较清醒、正确的认识的。他们指出,通过“地理大发现”,西方列强首先占领南北美洲,既而是瓜分非洲,今“非洲剖讫”,于是“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同上)由于中国已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它们的侵华步伐较前更加加快。康有为沉痛地指出:“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同上)在1898年开头的一个多月中(“元旦以来,春分以前”),竟然达到“失地失权乃至两日而一事”的惊人程度(康有为:《保国会序》)。他预言,这种局势今后不仅不会缓和,而且还将加剧。因此,他严厉告诫说,若不及时变法维新,“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且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上清帝第五书》)

全面地说,维新派所关心的不只是“皇上与诸臣”的命运,而主要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通过对帝国主义这个新怪物的初步认识,他们深深感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乃是亡国灭种的危险。经由日本译文,中国人知晓了“帝国主义”一词,并在20世纪初开始对帝国主义作初步的理论探讨。梁启超常常将当时的帝国主义称作“民族帝国主义”。对此,他曾作了这样的说明:

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

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为我尾闾。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工业，或以教会，而一用政策以指挥调护之是也。（《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

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一定义显然不科学，但可贵的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外在表象却作了颇为扼要的概括。其一，帝国主义是极力向外扩张的；其二，帝国主义向外扩张采取了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宗教的一切手段；其三，这一切手段又通过一定政策来贯彻。关于所谓“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在另一处他作了这样的说明：“自前世纪以来，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盛，而欧洲全境，遂有生产过度之患，其所产物不能不觅销售之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原来，这里他是指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生产过剩”。梁氏认为，为了解决“过剩”而造成的“膨胀”，西方必然要广求“殖民之域”（同上）。这些文字说明，梁启超等人当时已朦胧地看到这一基本事实，即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决定了他们势必要在世界范围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向外扩张乃是它的本性。

由此，梁启超等人进而指出了西方帝国主义与古代侵略者、征服者的区别。梁氏认为，同是向外扩张，古代的征服者如亚历山大、成吉思汗等乃是一种穷兵黩武行为，旨在军事征服、版图扩张，而今天的帝国主义主要是“觅销售之地”。今天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非属于君相之事，而属于民间之事；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同上）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具有强烈的经济目的；它的发动者不只是“君相”个人，更主要的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是为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帝国主义的全

面侵略较之古代的军事征服，给被侵略者带来的影响、危害要更为严重。

此外，他们还亲眼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古代“灭人之国”主要是毁其宗庙社稷，废其皇统，其性质是改朝换代。而帝国主义灭人之国所用的则是“灭国新法”。它们在侵略东方时，对于东方被侵略国的宗庙、社稷、皇统并不那么重视。比如，法国吞并越南后，依然保留了原先的阮氏王朝。日本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之后，在一个时期内也依然保留了李氏王朝，甚至还让李王由称王而称帝。它们所图的并不是那里的皇统，而是土地、人民、财富。对人民来说，所面临的并非是皇室易姓、朝廷易主，而是空前的民族灾难，其严重性与改朝换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帝国主义既欲以殖民地为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就势必要“占尽小民生计，并小民之一衣一食皆当仰之以给。”谭嗣同愤慨地说：“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

因此，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是一场巨大、深重的民族灾难。一旦帝国主义得逞，中华民族将“胥为白人之奴役”，中国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湖南南学会成立，梁启超在《南学会序》中说：“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所表达的正是对亡国灭种的忧惧。因此，维新派所大声疾呼的救亡图存具有新的含义，它不单是救某朝之亡，图某姓皇统之存，而是救中国之亡，图中华民族之存。保国会所列宗旨曰“保国、保种、保教”，正标明了这一点。谭嗣同曾说，自甲午战败后他常常“当饷而忘食，既寝而复兴，绕房徬徨，未知所出。”（《思纬 壹壹台短书·报贝元徵》）其实，在当时，如此忧国忧民者断非谭氏一人，而是一批被惊醒的中国人。深重的民族灾难和民族危机使几代中国人陷入深深的忧患而无以摆脱。由于这种忧患是出自对国